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29冊

錢穆對胡適的批評：
有關治學思想與方法的比較研究

李寶紅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錢穆對胡適的批評：有關治學思想與方法的比較研究／李寶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30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29 冊）

ISBN：978-986-322-039-8（精裝）

1. 胡適 2. 學術思想

030.8

101015395

ISBN-978-986-322-039-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二九冊

ISBN：978-986-322-039-8

錢穆對胡適的批評：有關治學思想與方法的比較研究

作 者 李寶紅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錢穆對胡適的批評：
有關治學思想與方法的比較研究

李寶紅 著

作者簡介

李寶紅，女，1972年7月生，湖北省紅安縣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1990年進入湖北大學歷史系學習，1997年畢業於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進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任教，2010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思想文化史。

提 要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現代學術建立與發展的時期。胡適是現代學術的奠基人之一，其治學思想與方法對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影響。錢穆護持中國傳統的讀書、治學模式，對胡適等新派學者的治學思想與方法展開激烈批評。本書以錢穆對胡適的學術批評作為研究對象，以展現民國學術的複雜面相，討論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的諸多問題。

著作主要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反映錢、胡治學宗旨的歧異：是做「士」還是成一「專家」。近代學術研究的主體已由傳統社會的讀書人向知識人轉變，其知識結構、治學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主張「為學術而學術」，推崇專家之學。在讀書人日益向知識分子轉化、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職業化的時代，錢穆堅守傳統的士人精神和士人心態。他特重中國傳統「士」這一社會流品，重視人格完善與德性修養，要成就一理想人。同時，在他看來，為學與做人是一事之兩面，人乃是一切學問之中心。錢穆批評近代學術「學與人離」，對同時代學風、學者心術也有較多討論，對民國學術界刻薄、不厚道的心理予以激烈批評。錢穆淹通經、史、子、集四部，在人文學科中可稱得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為傳統國學的通儒之學。他主張，治學貴能貫通古今，識其全部，強調「通識」，提出先「通」後「專」，以「通」馭「專」的治學方法。胡適徘徊於博通與專精之間，但他對學生學術上的指導，走的顯然是專家之學的路子。錢、胡對學生治學的指導，正反映了他們對「通人」與「專家」的不同理解和要求。

第二部分反映錢、胡治學路徑的根本分歧。錢穆自學名世，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解讀自成系統，「善於從中國自身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中去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他認為，「中國學術，實自有其獨特性，而非可以專憑西方成見以為評騭，

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規以資研窮」，強調「我們總不要隨便地把西方觀念同中國觀念混起來」，堅持學術研究中的中國立場和中國氣派，批評胡適「逕依西學來講國故」。不同的讀書法體現了不同的治學模式，錢穆強調讀書要虛心體察，回到歷史本身，儘可能還原歷史。胡適認為讀書要多戴幾副眼鏡，用域外文化作比較參考的材料，從中得到啟發或暗示。要剔除歷代學者的酸腐意見，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本部分通過錢、胡論讀書、關於《詩經》的研究等，具體展開論述。

第三部分有關義理、考據、辭章之辨，闡述錢、胡對這三者關係的不同認識。胡適發起科學的整理國故運動，將傳統的考據學與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結合起來，使考據「科學化」。在其影響之下，民國文史學界籠罩在濃厚的考據學風之中。義理、考據、辭章合一，是錢穆學術思想最為核心的觀念。對顧炎武「博文行己」、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不同認知，具體反映了錢、胡對考據與義理關係的不同認識與側重。錢穆認為，近代以來有風氣，無學問，諸多文化討論（議論）缺乏歷史的依據，只是「歷史的敘述」而絕非「歷史的真相」，強調文化討論和思想宣傳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考據當以義理為歸宿，義理（思想）應從考據中來。

第四部分著重考察錢穆與胡適等「科學考訂派」「科學的」整理國故在考據方法上的不同。錢穆對胡適倡導的「科學整理國故」運動頗多批評。錢穆的考據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都是以普通資料貫串會通，並不以新、奇資料炫人，甚至資料不足時，可推演以求。他激烈地批評學術界刻意追求、炫耀新奇史料的做法與心態，批評不講求學術積累，只是翻書、找材料的「研究法」。此處還將進一步討論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的相關治學思想，如「史學只是史料學」、「沒有證據不說話」等，是否是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欺欺人？歷史學從根本上講，離不開假設和想像，是一種「推理之科學」（王爾敏語）。錢穆將考據與思想、時代、社會緊密地聯繫起來，認為考據必須先參透思想本身，離開思想單憑考據等外在事象來研究學術史，正是胡適病痛所在，並提出了根據「思想線索」來考據的方法。

錢穆、胡適的治學思想與方法的差異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向，錢穆屹立於胡適所開創的學術主流的邊緣。傳統日漸式微，現代化（西化）成一不可阻遏之潮流。在學人知識結構更新、學術研究職業化體制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治學理念、路徑與方法均發生重大變化，胡適所開創的學術研究新模式易於為人追摹、仿效，錢穆孤往而寂寞。但是，錢穆所堅守的讀書、治學思想與方法，對現代學術的諸多流弊具有重要的糾偏作用，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珍視。基於此，探討錢穆、胡適二人治學路線，統合二者之優長，尤顯必要。



目

次

緒論	1
一、選題意義	1
二、研究現狀述評	4
三、基本思路與研究方法	17
四、錢、胡交誼	18
五、「打鬼」與「溫情敬意」	26
第一章 治學宗旨：做專家抑或「士」	33
第一節 「學與人離」	33
一、爲學與做人，學術與心術	34
二、「新的國士精神」	54
第二節 通人與專家：指導學生的異見	62
一、「此項文字可以給你一個學術的地位」	62
二、「須先求爲一通人，再求成爲一專家」	76
三、從「通人」到「通材」	88
第二章 治學路徑：回到歷史本身和西學的眼光	97
第一節 「中國學術自有特性」	97
一、「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의整理與解釋」	97
二、「當從中國舊學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尋求瞭解」	101
第二節 「虛心」與「懷疑」：不同的讀書法	110
一、朱子讀書法	110
二、「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116
三、「讀書生疑，仍自虛心熟讀白直曉會來」	121
四、書背後的人	125
第三節 歷史怎樣還原？	129
一、「站在歷史立場看，應該有一歷史的說法」	130
二、「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137
第四節 以《詩經》研究爲例	140
一、「你必須多備一些參考比較的材料」	140
二、「讀《詩經》，便應知有風雅頌與賦比興」	143

第三章 義理、考據、辭章之辨	153
第一節 「只此『考據』二字，怕要害盡了今天中國的學術界」	154
一、錢穆：義理、考據、辭章合一	154
二、胡適：考據的「科學化」	160
三、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	174
四、「考史之『密』與夫論史之『疏』，兩趨極端」	182
第二節 對顧炎武「博文行己」、章學誠「六經皆史」的不同認知	191
一、半個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	191
二、「六經皆史料」乎？	198
第四章 考據方法：批評與論爭	209
第一節 對胡適等「以新奇資料相炫」的考據方法的批評	209
一、材料與新學術	209
二、「覓人間未見書」	217
三、讀人人必讀之書	227
第二節 想像與考證	231
一、古史之「真相」與古史之「想像」	232
二、胡適、傅斯年「沒有證據不說話」？	235
三、「史法上一個重要問題」	245
第三節 有關「思想線索研究法」的論爭	249
一、「一個比較可靠而可以少錯誤的新方法」	249
二、「這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	254
三、「每一家之思想，則必前有承而後有繼」	260
四、「史學可為絕對客觀者乎？」	271
結 語	279
參考文獻	285
(一) 資料類	285
(二) 研究著作類	289
(三) 研究論文類	294
後 記	299

緒 論

一、選題意義

晚清和民國初期是中國學術思想與近代西方學術思想交流、衝突、融匯並發生巨大轉軌的時期，中國傳統學術形態向現代學術形態轉型。學術研究走向分科化、職業化、制度化、體制化，在學術研究的主體、學術研究機構及學術中心、學術研究理念及宗旨、學術研究方法、學術研究對象及範圍、學術研究成果及交流機制、學術爭鳴與成果評估等問題上均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學術轉型開始於 19 世紀中後期，到 20 世紀 30 年代基本完成。這一過程中，一批學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適（1891～1962 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他是「20 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註 1〕在推動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方面可謂居功甚偉。錢穆（1895～1990 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其一生，可謂特立獨行，自居於學術界、文化界的邊緣地位，不認同胡適等人所開創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主潮。在錢穆眼中，這是一個「學絕道喪」的年代。對於同時代種種流行論說，不能苟同。不平則鳴，錢穆對同時代流行論說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文化上，「一生為故國招魂」，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反對西化思潮。學術上，批評「科學考訂派」（或新考據學派）重考據、輕義理的治學思想以及不注重學術積累、以新奇資料相炫的治學方法。政治上，反對清末以來中國傳統政治「黑暗專制」、中國是一「封建社會」等言論。他將學術

〔註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 2005 年版，第 126 頁。

界比作「一哄之市」，〔註 2〕如果真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哄之市，耐得寂寞，尙友古人，轉益多師。

自 1930 年代中後期以後直至暮年，錢穆點名或不點名地、直接或間接地、有意或無意地對胡適及其所開創的學術、文化潮流進行反思與批評，他希望對此加以救正，或者說他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來。錢穆與胡適之間的分歧，實際上就是學術發展路向的分歧。胡適是民國學術界和知識界的「大師」和「領袖」，是新學術和新風氣的主要開創者，曾屢言「但開風氣不爲師」。錢穆認爲，胡適沒有經過沉潛鑽研、慎重縝密的思考而輕率地開風氣。風氣既開，胡適必須爲此承擔主要責任，是很顯然的。儘管錢穆很多時候並未直接點名批評胡適，學術界的某些現象也不能全部由胡適負責，但錢穆內心裏，似乎有一揮之不去的「胡適情結」。余英時謂章學誠一生治學立言，受戴震影響太大，「其心中時時有一東原影子，故立論於不自覺處每與東原針鋒相對」。錢穆對此一意見深表贊同，可謂「一針見血」。〔註 3〕我們也可以說，錢穆心中時時有一適之影子，故立論於不自覺處每與適之針鋒相對。

王汎森在《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長文中提出，近代史學有三個大段落：第一階段是晚清民初，以梁啟超所開展的「新史學」革命爲主。第二階段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 1920 年代開始，胡適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所開展的工作。第三個重要段落是社會史論戰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在 1949 年以前，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佔據主流地位，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對 1920、1930 年代的新派史家，有種種不同的稱呼，如整理國故派、北派、新考據派、新漢學派，隱約都在指胡、傅、顧所領導的學風。其文中所謂的「新派」，便大抵是指胡、傅、顧所領導的學派。新派的批評者是散在全國各地的，尤以南京中央大學（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最有組織。爲討論上的方便，以「傳統派」概括之。〔註 4〕王爾敏在《20 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一書前言中，提出 20 世紀史學有兩個主流學派，一個是科學主義史學派，一個

〔註 2〕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 2005 年第 2 版，第 315 頁。

〔註 3〕 見錢穆《致余英時書》，1966 年 11 月 17 日，《素書樓餘瀝》，《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8 年版，第 447 頁。以下簡稱《全集》，只註明作者、篇名、冊數與頁碼。

〔註 4〕 見羅志田主編《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32 頁。

是馬列主義史學派，勢力最大，影響最深，也經營最久。20 世紀之初，傳統史家典範尚有柯劭忞、陳漢章、張爾田、劉咸忻（筆者按：應為忻）、羅振玉、王國維、孫德謙、王獻唐、金梁、余嘉錫等前輩。不出 30 年代，各亦淘汰出局。

「中國傳統史學不絕如縷，賴錢穆一派支撐至 20 世紀之終。」〔註 5〕

胡適等新派學者，睥睨一世。1922 年 8 月 28 日，胡適在日記中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老輩學者最沒有條理、系統，不是淺陋，就是落伍，連章太炎都已是「半僵了」。（註 6）新文化運動時期不滿於他們的舊派，往往緘口不言，不作公開批評，公開攻擊他們的舊派如林紓則不堪一擊。林紓反對白話文運動，說「吾固知古文之不當廢，然吾不知其所以然」，被胡適一再嘲笑，那時的反對派實在太差了。實際上，學術界的爭論以及傳統學人對新派的反思、批評始終存在，錢穆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他對胡適等人的批評時間長、涉及面廣，也極為激烈。

學術界往往注重一些被視為「主流」的學者和學派，而忽視了不少被認為是反對「主流」或處於「邊緣」的學者及其研究成果，以致很多學者的貢獻被淹沒。錢穆和胡適均屬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對民國時期的中國學術界以及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的香港、臺灣學術界、思想文化界具有重大影響，錢、胡都十分強烈的希圖影響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路徑與方法、中國文化的走向，甚至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發展道路。對於錢穆、胡適這樣兩位在學術界、思想文化界有著廣泛影響、在治學思想與方法、中西文化觀等方面有著重大分歧的學者，將他們聯繫起來進行對比研究，還十分欠缺。因此，本論文選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論文從錢穆對胡適的批評入手，對比研究錢穆、胡適的治學思想與方法，有助於辨析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方向及其中所呈現的問題，有助於深化錢穆、胡適的研究。

錢穆、胡適比較研究所關涉的問題實為中國學術轉型的問題，我們今天依然面對這些問題。而且，自新文化運動至今，胡適等人所開創的學術研究範式、治學思想與方法，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對比研究錢穆、胡適的學術思想，尤其是重溫錢穆對胡適等主流思想所作的批判，有助於我們

〔註 5〕 見王爾敏《20 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前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頁。

〔註 6〕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75 頁。以下簡稱《日記》，只註明卷數、頁碼和時間。

反思一百多年來學術、文化上的紛爭與歧異，有益於今天學術研究的發展。因此，本論文選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現狀述評

錢穆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1949年出走香港，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重視。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評論中點了他的名，文中說「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註7〕從此，錢穆作為封建主義史學的代表遭受批判。大陸改革開放前，談不上對錢穆的研究。

錢穆隻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臺灣，1990年以95高齡謝世。臺灣局勢風雲變幻，「錢先生竟成了一位不合時宜的學人」。〔註8〕在臺港地區，對錢穆學術思想的研究、闡發相對於其巨大學術成就而言，還是比較薄弱的。錢穆去世後，香港、臺灣學界和學人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香港法言出版社推出「錢穆悼念專輯」（《法言》1990年10月號），臺北民間史學雜誌社推出「錢賓四先生逝世百日紀念」，新亞研究所編輯出版了《紀念錢穆先生論文集》（1991年）。錢先生的高足余英時、嚴耕望相繼出版了《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三民書局，1991年）、《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以為悼念。1993年6月，《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創刊。1994年，李木妙編《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由新亞研究所印行。對錢穆學術思想作專題研究的有戴景賢專著《錢穆》〔註9〕（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1995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舉行了「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註10〕2000年，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行了「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對錢穆學術作了多方面研究。與本論文相關的重要論文有王晴佳《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係，1926～1950》、吳展良《學問之入與出：錢賓四先生與理學》。王晴佳認為，在1950年以前，錢穆的學術生涯，如果從他

〔註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5頁。

〔註8〕《錢胡美琦女士致辭》，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

〔註9〕可參看陸玉芹《論戴景賢對錢穆學術思想的解讀》，《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註10〕會議具體情況可參見羅義俊《「負擔起中國文化的責任」——錢穆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述要》，《學術月刊》1995年第10期；《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紀盛》，《中國文化》第十一期。

與「科學史學」的關係來看，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時期，錢穆逐漸走出傳統，與新學間接觸並有所靠攏，試圖用考證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學問。這使他的著述，得到科學史家的讚賞，成為當時「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還是與胡適等人有區別。1931年錢穆到北大任教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他逐漸與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響的人物分離，而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強調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價值。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則表明他已經公開與科學史學的人物決裂了。吳展良指出，錢穆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他認為做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然而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理學之於錢穆，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理學的道理，是錢穆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他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頗為相異，不囿於理學的傳統。然而，其學終究歸本於為人之學，自孔子以至於宋明儒，源遠流長，薪火相傳。〔註11〕許松源指出，經、史關係問題一直是今人研究章學誠的盲點，而錢穆以「專家與通識」之說總結章學誠學術的要旨。「專家」是章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提出的重要學術觀念，章氏著述中許多言及經、史之處，其實是就經、史著作之中所蘊含的特定「專門家學」來討論，而非泛指經、史兩部而言。這些專門家學既用於治經，也用於治史，實即互通於經、史兩部，所以章氏論為學之道當本於專家，進而又講求擴充治學門徑，以期各門專業能交相為功，通達於學術大體。錢穆指出《文史通義》最有價值的地方，正在章氏能從學術之整體來講一切學術。此即章氏所謂「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兼重專家與通識的學術思路。〔註12〕

大陸改革開放後，錢穆其人、其學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

〔註11〕 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又見《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12月。該刊特別開闢「錢穆與現代中國史學」專欄，刊載此次研討會論文4篇。另兩篇論文是：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戴景賢《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

〔註12〕 許松源：《專家與通識——章學誠的學術思路與錢穆的詮釋》，《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

《書林》1980年第4期刊發嚴北溟《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一文，推崇《先秦諸子繫年》是具有「中國現代化社會科學名著」水平的力作。1983年3月，新亞書院舉行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邀請朱光潛擔任主講人，年近九旬的錢穆專程從臺灣來港並與朱光潛教授會晤，新華社曾發過會晤「場面感人」的報導。^{〔註13〕}錢穆的學生吳棠回憶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曾經在錢穆任導師的一個文史研究班裏學習的情況，稱「錢穆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教授，現在臺灣省。他是一位治學嚴謹、著述豐富、生活儉樸的學者」。^{〔註14〕}《晉陽學刊》編輯《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錢穆部分由羅義俊執筆。《晉陽學刊》1986年第4期選登的《錢穆先生傳略》是縮改稿，對錢穆生平和學術、文化思想做了簡要介紹。

1990年，錢穆逝世以後，無錫政協編輯《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錢氏高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一書，係對錢穆學術思想、文化思想的闡發及懷念之作，1994年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極大地推動了大陸錢穆研究。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相對於其他著名學者而言，大陸錢穆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對錢穆的介紹、回憶之作，90年代以後對錢穆的研究風氣漸濃。可以說，大陸學術界對他作更多、更深入、更廣泛的研究，還是最近二十年間的事情。

20世紀80年代，錢穆學術代表作開始在大陸出版。中華書局出版了《先秦諸子繫年》（1985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86年）；嶽麓書社出版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1986年）、《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986年）；巴蜀書社出版了《論語新解》（1985年）、《中國文學講演集》（1987年）、《朱子新學案》（1987年）。《中國文化史導論》被上海三聯書店列入「近代名籍重刊」1988年影印出版。《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孟子研究》、《惠施公孫龍》相繼收入《民國叢書》，由上海書店影印出版。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錢穆的學術名著《中國文化史導論》（1994年）、《國史大綱》（1994年）、《國學概論》（1997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97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2001年）等。三聯書店推出了「錢穆作品系列」18種，相繼出版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998年）、《中國史學名著》（2000年）、《湖上閑思錄》（2000年）、《中國歷史研究法》（2001年）、《中國歷代政治得失》（2001年）、《現代

〔註13〕新華社香港3月31日電，見1983年4月1日《光明日報》。

〔註14〕吳棠：《錢穆及其〈文史書目舉要〉》，《新世紀圖書館》1984年第2期。

中國學術論衡》(2001 年)、《國史新論》(2001 年)、《中國文學論叢》(2002 年)、《中國思想通俗講話》(2002 年)、《宋代理學三書隨劄》(2002 年)、《論語新解》(2002 年)、《孔子傳》(2002 年)、《莊老通辨》(2002 年)、《朱子學提綱》(2002 年)、《秦漢史》(2004 年)、《黃帝》(2004 年)、《古史地理論叢》(2004 年)、《新亞遺鐸》(2004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也連續推出了「錢穆作品系列」,已出版有《晚學盲言》、《人生十論》、《靈魂與心》、《文化與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也於同一年推出了錢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至八卷。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錢穆的著作在大陸風行一時。其中,有的多次印刷,有的印數巨大。錢穆 1949 年以前的著作基本上已在大陸公開出版,1949 年以後在香港、臺灣的著作,仍有相當部分未能在大陸印行。九州出版社擬推出新校、繁體豎排版《錢穆先生全集》,我們已經可以窺見錢穆學術著作的精華。

大陸較集中研究錢穆生平與思想的,基本上是以下幾位學者:羅義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是大陸新時期以來最早介紹錢穆生平的學人,並對錢穆史學思想做了初步研究。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系)、汪學群(原首都師範大學,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人聯合寫作了大陸第一部全面評述錢穆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專著《錢穆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年),介紹了錢穆的文化生命與學術生涯,他的民族悲情、憂患意識、崇高人格和淵博的學識,評述了他獨特的歷史文化觀、中西比較論、人生論及關於四千年中國文化史、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方法和卓越貢獻。汪學群隨後單獨撰寫《錢穆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對錢穆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做了系統梳理,將錢穆著作分為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及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學術史研究,並從中特別提出其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特點,作詳盡說明。徐國利(安徽大學歷史系),其博士論文《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於 2004 年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海內外第一部深入系統研究、評述錢穆的歷史文化觀和史學思想的專著。作者將錢穆史學思想提煉概括為「民族文化生命史學思想」,並以此為中心,展開對錢穆史學思想的研究。徐國利另有多篇相關論文在大陸發表,產生了一定影響。陳勇(上海大學歷史系),著力研究錢穆學術思想,已出版著作有《錢穆傳》(人民出版社,2001 年)、《國學宗師錢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近 20

年來，研究錢穆的學者日眾，粗略統計，不包括回憶和一般性的介紹之作，專題研究論文 1989 年 2 篇，1990 年 1 篇，1992 年 3 篇，1993 年 2 篇，1994 年 6 篇，1995 年 10 篇，1996 年 8 篇，1997 年 4 篇，1998 年 1 篇，1999 年 6 篇，2000 年 7 篇，2001 年 7 篇，2002 年 9 篇，2003 年 10 篇，2004 年 14 篇，2005 年 25 篇，2006 年 27 篇，2007 年 20 篇，2008 年 21 篇。以錢穆為專題研究的碩士論文日益增加，博士論文除上述徐國利論文外，尚有傅傑《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華東師範大學，1995 年）、芮宏明《錢穆文學研究述略》（華東師範大學，2004 年）、宋薇《錢穆美學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5 年）、侯宏堂《從陳寅恪、錢穆到余英時：以「新宋學」之建構為線索的探論》（華東師範大學，2007 年）（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題名《「新宋學」之建構：從陳寅恪、錢穆到余英時》）。

2005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由江南大學和無錫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主辦的大陸首屆「錢穆學術思想研討會」在錢穆的故鄉無錫市召開。會議圍繞著錢穆學術思想、錢穆與中國歷史文化、錢穆的文學思想、錢穆與同代文化名人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與交流。會議對大陸錢穆研究起了重要推進作用。

錢穆一生，治學、論學所涉極為廣泛。大陸地區錢穆研究主要集中於學術思想、文化思想的研究，對其文學思想、社會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人生哲學等方面，也有所論及。下面，只就與本論文相關的錢穆學術思想研究做一概述。

關於錢穆學術思想，較早前提出並引起各方爭論的問題是：錢穆是否屬於現代新儒家？1991 年余英時發表《錢穆與新儒家》長文，〔註 15〕不同意把錢穆劃入「新儒家」的旗幟之下。該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幾年時間裏由此展開了錢穆（乃至余英時）是否為「新儒家」的討論。《中國文化》第十三期（1996 年 6 月）同時刊發劉述先和錢夫人胡美琦的文章，劉文《對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專門回應余文，論證了錢穆是史學進路的新儒家。錢夫人則支持余英時的觀點（《讀劉著〈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一文有感》）。

大陸學者堅持認為錢穆屬於新儒家的主要有羅義俊等學者。羅義俊判認

〔註 15〕 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 1991 年版；《中國文化》第六期，1992 年；《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 年版。

錢穆所持的史學觀乃是新儒學意義的史學觀，其基本特質是凸顯展開史學而與儒學為一體，內聖與外王兩學並含而雙顯。既可說錢穆是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史家，又可說他是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儒家。〔註16〕並在《論〈國史大綱〉與當代新儒學——略及錢賓四先生史學的特性與意義》（《史林》1992年第4期）、《錢穆學案》（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等文中，對此再三闡發。大陸學者通常把錢穆與其它新儒家並列，如胡偉希《傳統與人文：對港臺新儒家的考察》（中華書局，1992年），方克立、鄭家棟主編《現代新儒家人物與著作》（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啓良《新儒學批判》（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柴文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等。

大陸學界對錢穆學術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五個方面：錢穆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方法論、錢穆的史學思想、錢穆的治學思想與方法、錢穆與顧頡剛疑古派、傅斯年新考據學派關係辯證、對錢穆某些學術觀點提出質疑等。

《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成名之作，以堅實的證據證明了康有為力主的劉歆偽造諸經之說不成立。劉巍指出，該年譜面世前後學者們的討論，最典型地反映了經學沒落、史學主位或經學史學化的趨勢。〔註17〕李帆認為，該年譜不是在一般意義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徹底破除了經學上的門戶之見，衝破了「六經皆史」說的藩籬，達到了將經學問題轉化為史學問題的目的。〔註18〕姚淦銘將錢穆兩漢經學研究的方法論總結為四個方面：破門戶之見，自由研究經學；辨析時代潮流，深知經學精神；就史以論經，史學與經學互動；廣心沉智，持平而論。〔註19〕李廷勇指出了錢穆考據古史善於貫通諸說層層推論的特點。〔註20〕《先秦諸子繫年》的考據方法尤為學界推崇，有學者概括為「宏博會通，尋源探本」，指出錢穆運用了考據學中本證、旁證、理證、存疑等方法去考辨諸子生卒年事。〔註21〕

〔註16〕《經國濟世，培養史心——錢賓四先生新儒學史學觀論略》，《史林》1995年第4期。

〔註17〕《〈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註18〕《從〈劉向歆父子年譜〉看錢穆的史學理念》，《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2期。

〔註19〕《錢穆兩漢經學研究之方法論》，《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註20〕《錢穆與中國古史考辨》，《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註21〕張在傑：《宏博會通 尋源探本——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的研究方法》，